

【理论与政策】

国际关系中的“美人之美”与理论创新

曾向红 杨双梅

【摘要】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因“无政府状态恐惧症”而排斥差异,使其倾向于采取同化或者消灭的手段应对差异,这也使得国际关系理论研究难以做到“美人之美”。“美人之美”是认识差异的一种态度、处理差异的一种策略和与差异共处的愿景。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不仅需要“各美其美”的文化自觉,还需要“美人之美”的文明互鉴,进而实现“美美与共”。中国国际关系学者基于尊重学科差异、时代差异与文明差异而进行的有益尝试,这种构建全球国际关系学的努力为“美人之美”开辟了空间,而区域国别学的设立则为在理论层面推进和落实“美人之美”提供了机遇,这就需要区域国别学尊重学科差异、尊重地域差异、尊重文明差异。唯有如此,中国学者才能打造直面国际关系中诸差异的学理体系,进而为实现国际关系中的“美人之美”提供助力。

【关键词】全球文明倡议;无政府状态难题;双重运动;美人之美;区域国别学

【作者简介】曾向红,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兰州大学上海合作组织研究中心教授(兰州 730000);杨双梅(通讯作者),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北京 100089)。

【原文出处】《东北亚论坛》(长春),2024.3.18~3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研究专项(21VGQ010);兰州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重点研究基地项目(2023jbkyjd003)。

2023年3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首次提出了“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文明倡议旨在为如何促进人类文明共存共荣、协同发展提供中国智慧和方案。该倡议呼吁人们对他者、异文化、外来文明采取一种交流互鉴、包容学习的态度。尽管全球文明倡议要落实到现实国际关系中仍需要克服诸多障碍,但其提出无疑有助于国际社会意识到“美人之美”的重要性和规范意义。事实上,迄今为止,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似乎尚未学会如何正确对待国家、文化、文明等之间的差异,由此带来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国际关系中的差异问题”。而全球文明倡议恰恰能为应对这一问题提供一剂清醒且对症的处方。从理论创新的角度而言,我们迫切要去思考,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迅速演变的当下我们如何面对和处理“差异问题”,同等重要的是,这种处理方式对于国际关系理论创新又

能带来什么样的启发。

一、何为“美人之美”

全球文明倡议明确指出,要共同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文明交流作为“各美其美”的重要基础,能够让我们正视和尊重世界文明之间的差异,以消除因误解而产生的文明隔阂。文明互鉴则是助推“美人之美”的重要方式,能够让我们接受并欣赏文明之间的差异,以打破因分歧而产生的文明冲突。文明包容则是实现“美美与共”的必由之路,能够让我们将差异转化为文明进步的动力,以摆脱因偏见而产生的文明优越。由此,要共建世界文明“美美与共”的美好愿景,就需要从“各美其美”和“美人之美”做起。

费孝通先生倡导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16字箴言不仅仅是对人类学研

究和发展的前景展望,也是对人类社会美好愿景的悉心勾勒。事实上,这也是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所蕴含的内在要义。无论是在对内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过程中,坚持增进共同性、尊重和包容差异性的民族工作原则,还是在对外倡导全球文明倡议的过程中,坚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共同倡导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的重要理念,都反映了中华民族尊重和包容差异的态度。与此同时,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再度证明现代化并不等于西方化,当今世界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各具特色的现代化道路,也呈现了世界文明的多样性。诚如费孝通所指出的,不同群体的生存和发展经验,使得不同群体对“美好生活”可以有不同的内涵,因而需要“各是其是,各美其美”,这是各个群体社会生活所赖以维持的价值体系。事实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也是中国式文化的表现,包含了“各美其美、美人之美”。这意味着要能够从别人和自己不同的东西中发现美的地方,方能真正地“美人之美”,形成一个发自内心的、感情深处的认识和欣赏。^[1]然而,不同文明之间囿于地理的边界,往往处于“各是其是”的状态,“美人之美”难以成为不同文明间普遍的交往方式。而要推进“美人之美”,仍然需要正确认识其理论内涵和实践要求。

从国际政治来看,“美人之美”的核心要义仍然是一种承认的政治,这种承认不仅仅是对他者或差异从存在本身予以承认,同时还意味着一种互动过程中的承认。前者强调的是认识并尊重差异的出现,如认识到世界文明的多元、国家发展道路的差异、国际体系的结构变化等等;后者则强调赋予他者以特定意义的社会行动,这意味着在互动实践中应当承认他者具备与自我同样地位的施动者特点。或许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美人之美”的含义:一是“美人之美”是对世界文明多元呈现这一现实的主观认识。如从国内政治而言,不同行政单位之间、不同城市之间都存在着民俗风情的差异;而国际政治更

反映了不同国家、不同文明等多维度上的差异性和独特性。二是“美人之美”是不同文明差异互动的一种客观过程。不同文明存在着交流互动,而这一过程就需要尊重和鉴赏,进而促进文明间的相互学习和彼此借鉴。如中华文明自身就是包罗万象,在多民族文化互动交往中形成的多元文明;而无论是亚洲文明,还是欧洲文明或美洲文明,都是文明互动过程中互学互鉴而发展形成的。由此,“美人之美”是承认文明差异和多元的主观认识,也是承认多元文明交往塑造的一种客观结果,二者相互联系,相辅相成。

尽管从理论内涵来解读“美人之美”是相对从容的,然而国际关系的现实却揭露了“美人之美”道路的艰难。追溯到国际关系学理论建构的起点——无政府状态——由主权国家构建的国际体系并不存在一个世界政府。正是这一基本假定使得理论家将国家间竞争乃至冲突视为一种常态,由此引申出对国家间差异的消极认知,更无从谈及如何“美人之美”。^[2]如海伦·米尔纳(Helen Miner)认为:“当代许多国际政治理论,都把无政府状态看作是国际政治的基本假说。”^[3]英国学派代表人物赫德利·布尔(Hedley Bull)明确指出:“人们可能会认为,这种无政府状态是国际政治生活的主要事实与理论思考的起点。就许多关于国际社会富有成效的研究而言,它们都与探索国际社会由于缺少政府而带来的后果有关”。^[4]秦亚青认为,无政府状态的假定,对于国际关系学科来说,具有本体论、方法论与学科意义三重内涵。^[5]由此可见,无政府状态这一概念对于西方国际关系知识的生产和理论的构建具有毋庸置疑的基础性意义。从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来看,无论是现实主义讨论国家间权力分配格局,还是新自由制度主义寻找国家间合作的制度方案,抑或是建构主义探索通往世界和平的集体身份构建,上述流派进行理论建构的起点均是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而这一假定也恰恰成为国际关系在处理差异时

的软肋,也构成了国际关系学科发展尚未逾越的“无政府状态难题”(Anarchy Problematique)。^[6]

在处理“无政府状态难题”的过程中,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内在地具有明显淡化乃至忽视国家间差异的倾向。以经典的“三大主义”理论为例,结构现实主义基于人性假设定论国家行为,强调从霍布斯式的“自然状态”到“无政府状态”,国家会因彼此意图的不确定而陷入“安全困境”,由此采取自助手段以维持均势才能保证国际秩序的稳定。新自由制度主义希望探索如何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体系建立秩序,国际制度作为减少信息不对称而促进国家间合作的工具,也成为促进国际秩序稳定的可行方案。相比之下,建构主义希望从主体间互动的视角重新认识国际社会,进而强调“无政府状态是国家造就的”。由此重塑国家间的身份与观念结构,塑造一种具有共识的集体身份,最终可以推动国际体系走向世界国家。^[7]

令人遗憾的是,“三大主义”理论应对差异的方案具有“忽视乃至消除差异”的倾向。例如:结构现实主义希冀建立的权力“均势”,并没有摆脱大国权力斗争的现实,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默许了国家间权力分配格局所产生的实力差异。新自由制度主义尝试以有效运作的国际制度来维护秩序的稳定,但却忽视了制度创设者与参与者之间的价值观差异,尤其是诸多国际制度建立在西方自由民主价值观之上,这意味着制度参与者必须被动接受西方的规则进而忽视了国家之间的文明差异。建构主义所推崇的基于共识的集体身份,并希望由此推动国际社会的发展,这种强调国家间身份认同和身份同质性的做法也直接拒绝了身份差异。正因如此,国际关系理论未能提供“美人之美”的机会,也使得建立在西方中心主义基础之上的国际体系未能提供“美人之美”的方案。

换言之,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的“无政府状态难题”往往与对差异的拒斥如影随形。这种对差异要

么加以同化、要么加以清除的倾向,被法国学者茨维坦·托多罗夫(Tzvetan Todorov)称之为“双重运动”(double movement)。^[8]究其根源,这与国际关系学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门“西方的(美国的)社会科学”密切相关。^[9]在西方的政治话语中,对文明与野蛮的等级性划分直接影响了理论家的世界观。^[10]其中,贯穿于欧洲文化传统的“西方中心主义”也对国际关系学科产生了深刻影响,这种西方中心主义本身就包含了“双重运动”的手法,如从地理大发现后对印第安人采取的同化措施而抵制差异,到现代化进程中推崇西方式现代化而忽视不同地区的差异,这也反映了西方思想传统始终未能摆脱“双重运动”的逻辑,更无从谈及寻求世界文明的“美人之美”之道。^[11]那么,到底要如何探寻“美人之美”的道路呢?

二、如何“美人之美”

如何把差异融入国际关系理论,以及如何用文化差异的重叠空间理解国际政治现实等重要问题,仍需要学术界进行艰难探索。就此而言,尝试将文明重新带回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的彼得·卡赞斯坦(Peter Katzenstein)等人的努力值得赞赏。卡赞斯坦主编了一套有关世界文明的丛书(包含《世界政治中的文明:多元多维的视角》《英美文明与其不满者:超越东西方的文明身份》《中国化与中国崛起:超越东西方的文明进程》三本),该丛书在明确承认世界上多种文明并存、每种文明内部存在丰富多样性的基础上,积极探讨了文明互动对于世界政治的意义及其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可能带来的启示。^[12]不仅如此,该丛书摒弃了文明研究中的本质主义观点,并注意到文明内外部行为体对文明所持的多元化理解,这是对诸如“东方”与“西方”等文明原生主义论观点的修正,也是对世界文明发展进程的有益思考。不过,尽管卡赞斯坦等注意到“文明的进程具有两面性,一面是指将他者文明重塑为更接近自我文明的过程,以改造或完全同化的方式;另一面是指他者通

过内化自我的部分特征,进而对文明中心施加影响的过程。”^[13]他们依旧未能如纳伊姆·伊纳亚图拉(Naeem Inayatullah)与戴维·布莱尼(David L. Blaney)所指出的那样,从根本上摆脱对“双重运动”手法的依赖。事实上,任何一种文明本质上都是自我和他者混杂的,自我之中就有他者,双方在接触区或中间圈是相互依存的。换言之,虽然卡赞斯坦等人在研究中注意到世界文明是多元多维的,但它们对文明或国家之间差异的理解依旧过于线性,仍然隐含着西方对待差异时所持有的高人一等、唯我独“美”的心态。相对于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基于对西方文明主导地位丧失的担忧而讨论文明间冲突,卡赞斯坦等学者基于多元文明观念共存的事实讨论文明间交往与跨文化接触的学术努力,至少从道义上更令人赞赏。

由此,如何在文明间交往和国家间互动中促进“美人之美”也成为必须回答的现实问题。法国社会学家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指出:“诸文明各有特点,各文明的产物都有自己的风貌,整体分析这些风貌,可以得出诸文明各自专有的独特形式,这一形式可称为‘文明类型’。”^[14]那么,至少在处理不同文明类型之间关系时,需要依照如下方式来推动“美人之美”。首先,“美人之美”需要欣赏自身之美,这需要形成“文化自觉”的意识。也就是说,在文明间交往中,要学会欣赏自己的“美”。在欣赏自我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一种文化自觉意识,既要增强对自我文明的认同感与自豪感,也需要树立一种“自我反省”的态度,能够对文明产生一种自知之明。对自我文明的欣赏并非一种孤芳自赏,也需要以他者能够接受的方式去讲述自我的文明。同时还需要认识到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性,避免产生一种狭隘的“唯我独美”观念。^[1]其次,“美人之美”需要欣赏他者之美,这需要培养“文明互鉴”的态度。所谓欣赏他者之美,必须认识到他者的存在,既包括内在的他者,如同属于东亚文明的中日韩文化也存在差异;也包括外部

的他者,如区别于亚洲文明的欧洲文明、美洲文明。在认识和欣赏他者的过程中,不仅需要避免盲目地“从人之美”,也要避免宣扬“文明优劣”。最后,“美人之美”需要践行“各美其美”,这要求培育处理差异的能力。“各美其美”并非是对文明间互动的拒斥,而是希望在文明间接触的过程中认识并尊重差异,并能够学会处理差异。这就需要我们注意到不同文明之间除了差异性外,还存在着在交流传播过程中形成的文化接触区,而这才是推动文明间交往和繁荣的宝贵资源。^[15]显而易见,“美人之美”建立在“各美其美”的基础之上,也反映了对文明间差异从认识差异到尊重差异的过渡。这就需要我们妥善处理“各美其美”与“美人之美”的关系,既要避免陷入“唯我独美”的“文明优越论”,也要避免陷入盲目崇拜其他文明“唯他独尊”的境地。

鉴于差异在文明间交往中的特殊地位,如何处理文明间差异也是推动“美人之美”的必由之路。现代国际关系理论关注西方文明的崛起,以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立的主权国家体系的全球扩张为研究起点,这种世界观不仅掩盖了其他文明在世界秩序演变中的角色和贡献,也导致对国际关系研究陷入狭隘的欧洲或西方中心主义。随着对全球国际关系研究的呼吁,从历史文明而非民族国家的角度研究国际关系,有助于发现其他文明在世界秩序演进中的作用,尤其是中国、印度等古老文明开创了不同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国际制度和世界秩序。相对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在处理差异时的“双重运动”,中国国际关系学者如何在理论研究中回应差异问题?对于这一问题,仍需要我们进行更深入的思考,并积极探讨有助于推进理论研究“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的创新性。鉴于当前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依旧处于构建具有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文化自觉”阶段,故人们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如何助力国家之间的“美人之美”依旧关注不多。本文拟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共享的无政府状态假定入手,探讨它

们对待国际无政府状态的态度,以及这种态度如何影响到它们处理国家之间差异的做法。之所以选择从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无政府状态这一基本假定入手,是因为西方在理论研究所体现出的对无政府状态的恐惧,根源在于对国家之间差异的排斥与害怕。因此,从“无政府状态”这一国际关系学的立论之基入手,不失为一个合适的切入口,以此启发中国学者应如何修正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对待国家之间差异的态度。

中国国际关系学者在理论创新的过程中,需要重新思考无政府状态这一概念或假定对于理论构建的意义,尤其需要反思或修正对无政府状态在规范和价值维度的认识。这并不是挑战无政府状态的假定,而是希望澄清:基于无政府状态的假定,会给人们处理国际关系中的差异带来严重且难以逆转的消极影响,进而难以实现“美人之美”。事实上,无政府状态是有其积极意义的。世界从来就是一个文化、文明、世界观、政治制度、发展道路、发展模式等各方面多元的世界。无政府状态的存在,至少为捍卫这些丰富内容不轻易被暴力摧毁留存了余地,尽管这种空间在霸权和强权政治下岌岌可危。多元因素具有重要价值,它们的留存和发展,实际上是保留多种生活方式、多种想象世界的方式和多种“善的生活”的可能。因此,捍卫国际无政府状态,实际上是在于捍卫世界的多元性,并为保持世界发展前景的开放性留存空间。如国际关系伦理学家默文·弗罗斯特(Mervyn Frost)指出,国际“无政府状态”从伦理意义上具有九个方面的优势,如国际“无政府状态”不仅会包容多元性,而且还可以促进这种多元性的成长;由于支持和鼓励世界多样性,行为体可自主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路径并进行调整试点;每个国家都拥有自卫的手段,对某个国家或某些国家的征服,并不意味着整个国际“无政府状态”的湮灭,从而为反击侵略提供了可能;国际“无政府状态”是开放的,它并非欧盟那样内外有别的封闭式同盟,从而保障了

行为体的大致平等地位,等等。^[15]

由此可见,国际关系学者需要克服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所蕴含的“无政府状态恐惧症”,积极挖掘无政府状态的正面价值,探索和构想国家在此状态下的友好相处之道,进而为国家之间“美人之美”切实做出理论贡献。在这一理念指引之下,要促进“美人之美”至少需要遵循如下实践要求,而这些要求能够在操作层面对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提供启发。

第一,从认识论层面来讲,“美人之美”是一种正确认识国际关系中差异的态度。这种态度既是“各美其美”前提的进一步延伸,也是对国家间差异和文明多样性的重新认识。就不同文明之间的互动而言,我们要认识到差异的存在,即自我是相对于他者而言,既要正视与内部他者的差异,也需要尊重与外部他者的差异。就内部他者而言,正如我们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进程中,尊重各民族文化,认识到不同文化的独特性,从而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就外部他者而言,中华文化之外还存在着不同区域的文明,而正是差异性推动了世界文明的发展与演进。因此,在构建国际关系理论的过程中,至少需要从认识论层面正确看待差异。即便是基于无政府状态这一基本假定,也需要充分认识到不同文明、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独特性,进而寻找破解无政府状态这一难题的突破口。这种态度既需要认识到不同国家的特殊性,也需要尊重各国的实际情况,而不应以“文化霸权”“文明优劣”的态度刻意污名化他者,也不能信奉所谓的“文明标准”贬低他者,甚至以“文明与野蛮”的人为立场扭曲差异,进而使国际关系仍然束缚在“X文化中心主义”的思维陷阱。

第二,从方法论层面来看,“美人之美”是一种正确处理国际关系中差异的策略。这种策略既建立在尊重差异以确保“各美其美”的基础上,也需要在国家间交往中促进文明间交流互鉴以欣赏差异。由

此,比较的视野能够为更好地理解他者并“美人之美”提供帮助。所谓的比较需要明确“以何种标准比较”,这就需要明确,独特性是相较于多样性而言的,并从“和而不同”的角度去比较不同国家、不同文明的差异性。就国际关系而言,纵使无政府状态使国家陷入“自助”的国际体系,但客观上也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各国的独特性,能够使国际社会呈现初步的“各美其美”形态。而要实现“美人之美”,则需要认识到国家并非“单一的”,其内部实际上千差万别,国家之间更是因政治制度、经济基础、社会文化等存在差异。由此,这就要求人们在实践中尊重各国独特性,并正确处理国家之间的差异。无论是各民族相互借鉴而赋予中华民族强大凝聚力,还是国家间相互欣赏而助推人类命运共同体,都离不开从“审美”视角解读差异。换言之,面对差异,“各美其美”是从认识论上对差异形成正确认识,而“美人之美”则是从行动层面对差异采取正确方式。如面对全球化进程中不同文化的传播交流,既要确保自我文化的独特性,也要避免“妄自尊大”和“从人之美”。从国家间关系发展来看,这就需要摆脱强制对他者进行“同化”的殖民主义做法,也要摒弃以“熔炉”思维消除差异的行为。换言之,当前的全球化进程,更加需要各国学会与他者共处,学会与差异共处,而促进国家间对话与合作是应对差异的必由之路。这就要求我们认真研究差异,围绕差异进行沟通和交流,进而促进对差异的学习与借鉴。

第三,从本体论层面而言,“美人之美”是维系人类生存、保留人类希望的必由之路。尤其是在当前全球性问题凸显的时代变局下,国际关系中的差异已经迫切成为国际社会必须正视的重要问题,文化、文明、经验之间的“互动互鉴、和而不同”不仅是人类繁衍至今的重要方式,而且也是人类社会继续发展的必要前提。这是由文化、文明等作为“关系性共在”(relational coexistence)的本体论决定的。^[16]任何文化、文明等作为关系体,事实上都包含了其他关系

体的因素或成分,从最小的关系体个人到最大的关系体世界体系或宇宙,实际上在本体论上并无二致,它们均是“跨体系社会”。在这种关系本体论的视野下,任何关系体“如果一定要追求它的‘本体论本质’”,那么其本质是一种被王铭铭称为“容有他者的己”的东西。^[17]显而易见,基于这种“关系性共在”的本体论可以发现,任何文化、文明等要实现自身的发展,必然要求尊重其他文化、文明的差异,并与之实现共同发展。如果消除了彼此间的差异,实际上也就消除了自身。如此一来,“美人之美”意味着:不仅需要承认全球化进程中存在“各是其是”的现实,也需要尊重国家之间“各美其美”的差异,同时还需要以“美人之美”的方式处理好差异。那么,面对全球化对差异产生的双重效应,全球化既放大了国际关系中差异问题的重要性,也凸显了国际关系因差异而产生的危机感。无论是发达国家因西方文明至上或优越而采取的文化霸权观念,还是后发国家因文化自我保护而产生的文化自觉意识,这两股力量之间都因缺乏对差异的妥善处理而使得人类社会离“美美与共”的全球文明愿景相去甚远。在此背景下,如何通过“美人之美”实现人类对美好社会的构想,也是回应全球化进程中诸多挑战必须进行的思考。

三、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创新如何助力“美人之美”

在国际关系中“美人之美”如此艰难,那么,作为具有“天下无外”“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怀远人柔万邦”等传统理想和抱负的中国能有何为?国际关系学者在创建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的过程中又当如何对待国家之间的差异?对于中国国际关系学者而言,面对无政府状态这一与政治学思想中的“自然状态”“无知之幕”等具有重要地位的类似概念,需要去思考以下重要问题:

首先,我们如何在理论研究中理性认识“无政府状态”这一基础假定?无政府状态这一概念有何思想源流?^[18]中国学者能否探索出有别于西方缓解无政

府状态的方案?从国际关系的核心概念入手重新思考学科发展,或许有助于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创新开辟出新的思想空间。如针对无政府状态概念在描述现当代国际关系不够准确的缺陷,有学者提出了国际关系可能处于等级制或朝贡体系的替代性概念。^[19]这并非意味着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摒弃无政府状态这一假定,而是希望寻找理解当前国家之间究竟处于何种关系状态的新思路。实际上,就涵盖范围、影响力、普遍性而言,这些概念目前尚不足以动摇无政府状态假定在国际关系学科定位中的地位。因此,如何探索理解国家间相处与共存状态的新概念,抑或寻找对无政府状态的新解释,都有待中国国际关系学者进行探索。正确认识国家间关系与状态是实现处理差异,进而寻求“美人之美”的必要前提。

其次,中国国际关系理论还需明确,如何做到在理论研究中真正地重视差异。从自我和他者的关系角度而言,重视差异涵盖“美人之美”“美美与共”两个阶段。第一,在“美人之美”的阶段,要求理论研究者积极对待各行为体共生共存的现实,承认自我与他者的相互纠缠和彼此嵌套,并在研究中主动、积极去挖掘他者的价值,并讨论对于自我完善的意义和启示。第二,在“美美与共”的阶段,需要自我和他者基于对彼此差异的欣赏然后协同创造,为天下大同贡献智慧和力量。不过,在“美美与共”方面,由于“美人之美”并非取决于某个或某些自我的独自努力,而有赖于国际社会全体,至少多数行为体的彼此欣赏,故这种局面的形成还有待时日。尤其是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仍然盛行的当下,国际社会“美美与共”仍是一个遥远的目标。

对于“美人之美”,中国国际关系学者已经做了富有价值和启发的工作。自21世纪伊始,随着中国与国际社会的交往愈加频繁,中国国际关系学者便已开始了构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道路。如果说之前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尚处于“以外来的概念解释

中国本土的现象”这一反向格义阶段,那么自21世纪以来,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便开始了“以中国本土概念来解释中国之外的现象”这一正向格义阶段。尽管这一阶段进展缓慢,但中国学者通过“正本清源、辨异求同、旧瓶新酒、分门别类”的方式进行了概念创新,为中国国际关系知识体系的创新进行了有益尝试。^[20]具有代表性的是赵汀阳的天下体系理论和秦亚青的世界政治的关系理论,本质上是承认并尊重国际关系中差异的理论研究路径。赵汀阳的天下体系理论从“天下无外”出发,把政治解读为“化敌为友”的艺术,而不是西方那种寻找敌人的斗争哲学,这一尝试的关键在于打破了文明之间的界限和壁垒,希望把世界内部化,通过共在存在论和关系理性重新反思世界政治的未来。^[21]秦亚青倡导的世界政治关系理论打破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主张的“原子式”本体论,以关系本体为基础,讨论关系实践具有的特点和对国际关系的转化作用。该理论拒绝了西方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观点,而是秉持一种共时共在的存在观:即自在与他在、与群在的共时共在,强调自我存在和他者存在以及群体存在是同时发生的。^[18]杨光斌呼吁建立的世界政治学同样希望跳出西方至上的排斥性文化,以中国和而不同的天下观重新审视世界秩序的发展与转型,从而建立一种涵盖全球政治的“元学科”。^[22]尽管上述理论也面临不同的评价,但至少从研究视角层面打破了西方国际关系思想中固有的二元对立思维,从而为人们直面国际关系中的差异开辟了空间。

从中国国际关系学科的理论创新来看,中国学者仍然需要继续秉承“美人之美”,推动“美美与共”。^[23]第一,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需要尊重学科差异,实现“跨界融合,博采众长”。实际上,中国学者已经尝试突破学科界限,促进学科间借鉴以推动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如以唐世平的社会演化理论为代表,通过借鉴生物学进化论中的“突变——选择——遗传”机制,创新性地提出了国际体系的演化

论,并否认了西方主流理论所假定的国际无政府状态恒定不变这一基础,强调国际政治系统也遵循着进化系统的逻辑。^[24]唐世平在构建其理论观点时并非一味推崇生物学理论,而是希望做到一种跨学科的借鉴与融合,尤其是在案例分析过程中将历史学、政治学、考古学等多学科知识融会贯通。这种理论创新并非建立一种“生物进化论”优越性的国际关系理论,而是希望从其他学科汲取养分以探寻社会科学进步的新思路。但就建立具有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国际关系理论而言,现有的跨学科借鉴仍然是初步尝试,如何将现有理论知识推广并得到国际认可仍然充满挑战。在未来的创新中,仍然需要尊重学科差异,借助交叉学科推动国际关系理论的新发展,这也是促进国际关系“美人之美”的重要方式。

第二,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需要尊重时代差异,做到“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无论是借鉴现代理论思考古代不同政体之间的关系,还是吸收古代哲学理解当前国家间关系,都需要尊重不同时代的差异。阎学通通过重新发掘先秦时期国家间政治的理论智慧,提出了道义现实主义理论,尝试从如何取代霸权的角度回答国际权力转移的路径。这一理论通过将中国古代哲学家的思想与中国崛起的现实相结合,强调了“道义”对权力转移的重要作用,即崛起国的战略信誉和道义影响着崛起的成败。这一理论尝试不仅做到了对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范式的遵循,而且通过引入中国古代政治来丰富该理论流派的推论,这种大胆尝试有助于打破理论间的藩篱,为理论的发展创新注入新的动力。^[25]尽管上述尝试有助于形成具有中华文化特征的国际关系理论创新,但从理论的硬核来说,道义现实主义如何跳出“现实主义”“权力转移”等知识话语来形成更具自主体系的理论,仍然有待进一步观察。就此而言,学者们仍需要处理好时空层面的差异,并从中国古代政治哲学或历史传统中汲取养分,在做到“古为

今用”之余,还需要结合当前的时代特征,避免“厚古薄今”。

第三,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需要尊重文明差异,做到“中为西用,文明互鉴”。如以秦亚青的世界政治中的关系理论为代表,从中国传统哲学中汲取智慧,并用“关系”来解释国家行为的逻辑。其目的并非以中华文化的经典概念来替代西方国际关系的核心概念,而是希望通过“关系性”来揭露被西方传统理性主义所忽视的内容。事实上,人作为个体,不仅仅是“经济人”“社会人”,也是“关系人”。关系理论从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上都做了有益的尝试,这有助于为理解世界政治提供一种非西方视角,而并非推崇一种“中华中心主义”的理论体系。^[18]尽管这种非西方视角有助于丰富对国际关系乃至世界政治的认识,但从理论创新而言,非西方视角仍然无法与传统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等量齐观。就目前而言,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主导地位仍难以撼动。这就需要一种尊重文明间差异的立场,致力于实现西方理论与非西方理论的平等对话。

诚然,上述理论的创新与发展面临着褒贬不一的评价。^[26]但至少从学科发展来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起步将有助于破解所谓的“理论终结说”,并有助于为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提供更多新知识。即便这些知识也许仍具有重要的“情境性”或“地方性”知识特征,但通过努力,它们成为“普遍性”或“一般化”知识的潜力将逐渐得到展现,而且这些努力也充分展现了中国学者尝试基于文化或文明差异而构建具有尊重诸差异的知识体系所付出的努力。不过,也需要指出,上述尝试的主旨仍在于借助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来探讨如何应对这个危机重重的世界,故可以认为,他们的努力在很大程度上仍处于肯定中国思想传统的“文化自觉”或“各美其美”的阶段,部分理论已初步呈现了“美人之美”的潜力,但对于如何真正进入到“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阶段——即直接面对和深入研究诸多他者、与不同他者进行

深入比较、进而欣赏他者差异——仍然需要做出更多的努力。^①因此,中国国际关系学者在理论创新过程中还需在面对、尊重和研究差异方面做出更大的贡献。当前,西方学者已经喊出了建立“全球国际关系学”的倡议,其意在深入研究第三世界国家或“第三世界”人们的诉求、视角、文化、传统、价值观、世界观等,并将其纳入国际关系学科中,以更好地体现国际关系理论的包容性和多元性。^[27]对于这一动向,中国国际关系学者予以支持并积极参与其中。^[28]不过,相较于西方基于几百年的殖民经历而积累了关于广大第三世界国家人民生活和对外交往的大量素材——西方人类学与世界史等学科即是处理这些材料的学科建制并产生了大量难以忽视的研究成果,中国人自近代“睁眼看世界”的时尚尚短、积淀有限,如何在与西方学者同台竞技的过程中,真正从理论层面上识别和尊重差异,中国国际关系研究者仍任重道远。中国学者或许可以发挥后发优势实现弯道超车,致力于更加全面、准确地把握世界上琳琅满目之“美”,并对这些“美”究竟“美”在何处做出令人信服的理解或诠释。正如田野所呼吁的,我们需要构建与西方平等对话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这就需要中国学术界积极探索诸如“关系”“礼治”等有效的正向格义概念。^[29]

四、区域国别学赋予“美人之美”新动力

理论研究不应停留于陈述“美”的阶段,还需要深入探讨这些“美”的理论意义与价值,并将其与自我之美进行沟通与对话。显而易见,这比基于文化自觉意识开展理论创新所提出的要求更高,要取得成效也更加困难。或许区域国别学学科的建立,能为中国国际关系学者在理论层面推进“美人之美”的事业赋予新的动力。从国际学术研究而言,冷战时期确立的区域国别研究仍然是美国话语乃至西方中心主义影响之下的学科。对中国而言,如何打破固有的思维定式和路径依赖,建立自主的学科知识体系已成为中国学界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重要问题。当

前,区域国别学已成为一级交叉学科,该学科作为面向他者并对他者开展深入研究的学科,既需要在“发现美”的过程中提供认识差异和他者的描述性知识,也需要在“认识美”的过程中提供解释差异和他者的学理性知识,同时还需要致力于为“美人之美”提供与差异和他者共处的应用性知识。这三类知识构成学科知识体系的基本类型,也是构建区域国别学知识体系的重要基础。^[30]这也对学术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区域国别学是对特定区域人群历史和现实生活世界的研究。如有学者指出:“一个‘区域’不过是一个跨学科的集体体验单位(cross-disciplinary unit of collective experience),该单位能通过在经济、社会、政治、宗教及其他生活领域的复杂互动而得到识别”。^[31]这也是为何区域研究长期以来主要采用文化人类学视角的原因。但是,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人们对特定区域的了解不再局限于对该地区人群文化的研究,而是拓展到了政治、经济、社会、对外交往等诸多领域,这内在要求区域国别学进行跨学科或多学科研究。区域国别学虽然希望能将其生产的情境化知识上升为普遍性知识,但鉴于该学科关注的是特定区域人群的活动,因而这些知识多数是情境性的知识。^[32]未来的区域国别学研究,需要妥善处理区域国别知识供给与国家发展的知识需求之间的关系。

如何探索并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区域国别学已成为学术界努力的目标和使命。这不仅关系到世界政治能否从“各美其美”走向“美人之美”的新阶段,也影响着人类社会能否实现“美美与共,世界大同”的理想愿景。在伊纳亚图拉和布莱尼看来,要避免在理论研究中复制“双重运动”手法,一条有效路径是在研究中采取民族志的研究方法。如此,“他者成为一种自我反省的资源,这不仅可以极大地改变自我对他者的看法,也可以改变自我对自身文化与传统的认知。如果我们想要以民族志学家的身份进行

互动,则需要学习如何将接触区产生的怀疑和含糊不清视为资源。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成为一种对话的参与者,这种对话‘有助于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启发’”,^[11]即通过“美人之美”实现“美美与共”。这种判断,与区域国别学的学科建设和科学研究中高度倚重人类学若合符节。^[33]

对国际关系学者或区域国别学者而言,增强人类学相关背景知识和理论素养,是在理论研究中为“美人之美”做出贡献的当务之急。要知道,没有丰富深入的情境性知识作为基础,或者在研究中没有“美人之美”的意识,区域国别学将仍有可能处于其他学科,尤其是国际关系学的阴影之下,其学科地位也难以真正确立。与此同时,仍需注意到另一种风险的存在,即区域国别学虽然迫切需要人类学等相关学科的襄助,但过于依赖人类学,也可能使其沦为人类学的附庸。因此,作为交叉学科的区域国别学,仍须形成自己的学科内核和理论范式,在跨学科借鉴的基础之上打造学科特色。区域国别学的出现,的确有潜力帮助中国学者避免重蹈西方“双重运动”手法之辙,并在理论研究中切实助推国际社会“美人之美”。诚然,区域国别学固然有光荣的使命,但也容易在各种传统学科的夹击下进退失据,至于如何在教学和研究中借助人类学等学科/民族志等研究方法提出创新性的学术概念或理论命题,从而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学科体系添砖加瓦,是国际关系学者或区域国别学者经过艰难探索后才能解答的问题。

不论中国的区域国别学到底以追求情境性知识为主,还是以生产普遍性知识为业,可以肯定的是,该学科的发展必须正视并深入研究国际关系中的差异。这意味着区域国别研究需要学会与他者对话。对话的前提是正确认识并尊重他者,这就需要认识到区域国别的多元性和差异性,同时要尊重不同区域国别的独特性和平等性。至少从学术研究的态度而言,需要保持一种客观中立的态度,摒弃“国强国

弱”或“某国优先”的认知偏见。尤其是不能因挑战“西方中心主义”的研究路径,而陷入“中国中心主义”的知识模式。正如杨成所指出的,“(区域国别研究)需要将研究对象和研究者置于平等的地位,把美国和西方当作一种可以对话的知识来源。”^[34]在对话的过程中,也需要秉持开放且包容的立场,正确认识并处理好差异,而非采取同化或消灭差异的方式。这就要求区域国别研究摆脱西方国际关系思想所暗含的“双重运动”手法,即:区域国别研究的知识生产,不宜采取简单的非此即彼、一分为二的简单做法。^[35]而是需要承认差异并尊重差异,尤其是不同区域、不同国别之间存在着更加显著的差异,处理好、应对好上述差异对该学科的发展和未来至关重要。

具体而言,首先,区域国别学应立足于交叉学科的定位,尊重不同学科之间的差异,做到“互学互鉴”。中国的区域国别学建设是打破单一学科边界的有益尝试,不仅仅意味着从课程设置与人才培养上突破学科壁垒,也要求区域国别研究跳出学科限制,从多个学科汲取养分。区域国别学的建立基于国家的战略需求,具有其独特的现实内涵和价值,尤其需要认识到区域国别研究是和国家战略部署、全球治理与全球文明对话等现实需求密不可分的学科。这要求我们不应局限于“地缘政治”的偏狭认识,而应尊重自然科学、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三大知识体系的差异性,在学科交流互鉴中寻找新的理论增长点,并丰富区域国别学的内涵。在这一基础上,不同学科知识体系所能提供的养分也会存在差异,如自然科学能够有助于深入了解不同区域国别因地理变化或人类改造自然而呈现的物质形态差异;而人文科学则有助于洞察不同区域国别因岁月变迁或人文互动而塑造的个体认知差异;社会科学则有助于认识不同区域国别因结构变化或人类活动而形成的社会发展差异。而前述内容均构成区域国别研究所需的知识范畴,同时,不同学科理论方法的互鉴也

是区域国别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途径。例如,中亚地区的自然环境变化与其族群分布是否存在关联?各国的语言政策是否影响着对外关系,等等。因此,如何推动区域国别研究从“学科交叉”走向“学科协同”也是当下需要思考的重要问题,而这就需要尊重学科之间的差异性。

其次,区域国别学应扎根于区域国别的现实,尊重国家和区域之间的差异,做到“等量齐观”。区域国别学作为一门学科,是回应时代之问和世界之间的必然要求,这意味着研究者不应固守在某个“国别孤岛”,而应以关联和发展的眼光看待不同国家和地区,摒弃“某国优越论”“某地区中心主义”等错误认识。具体而言,区域国别学既涉及作为个体的国别研究,也涉及作为整体的区域研究。就国别研究而言,国家因地理、文化、政治、经济等多重要素而产生的差异对于其成长为特殊的研究对象至关重要,这就需要以“各美其美”的态度予以认识。而就区域研究来看,无论是区域内部,还是区域之间都存在着语言文化差异、发展道路差异、政治结构差异等现象,对于这些差异需要持一种“将心比心”“心心相印”的同情式理解的态度,争取做到“视域融合”。事实上,国别内部差异、国别之间差异、地区内部差异、地区之间差异,上述内容在呈现国别区域研究多样复杂性之余,也为知识创新和理论发展提供了可能,或许通过比较研究能够寻找新的理论增长点。例如,中亚五国独立以来为何彼此间的差异呈扩大之势?各国在国家构建的过程中为何会采取差异化的路径?中亚地区的一体化水平为何不及东盟?作为欧亚地区的一个次区域,中亚地区的稳定程度为何远高于高加索次区域和东欧次区域,等等。由此可见,区域国别研究需要尊重并客观认识不同国别区域的差异,并将这些差异置于关联和比较的视野中,在获得关于特定国别区域的情境性/特殊性知识的同时提炼彼此间的共通性或普遍性知识。

最后,区域国别学应落脚于全球文明倡议,尊重

不同文明的差异,做到“美美与共”。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在服务于中国的重大战略需求的同时,还应以开放包容的心态吸收其他国别区域的文明成果,丰富区域国别研究的理论资源和实践经验,以更充分地彰显区域国别学的学科特色。或许全球性大国的区域国别研究的确比中小国家的区域国别研究要更为深入和全面,但身处全球化世界中,无论大小,任何国家均有接触和了解其他国家、文化、文明等的需求,即任何国家都会有涉及世界诸行为体及其互动的信息和知识储备。这均属于区域国别知识的范畴。换言之,在高度相互依赖的时代,仅以中国视角观察世界、研究全球,实际上并不能胜任中国的战略需要和时代的要求,故我们应以开放的心态甄别、选择、消化、融合涉及世界和诸文明的丰富信息和知识。这要求我们积极探索文明间交流对话的空间,无论是在文化接触区探索互学互鉴的方向和路径,还是在文化差异中寻找比较研究的可能及其启示,这都将是区域国别学发展的重要方向。基于此,我们有必要思考:区域国别学的研究主题能否界定为“以文明界定的区域或国家”?人类文明活动的丰富和复杂经历能为区域国别学提供哪些启示?文明视角如何解读2023年的沙特与伊朗和解?文明互动与古丝绸之路或“一带一路”倡议之间的关联性何在?等等。总而言之,区域国别学的发展不应局限于区域和国别的字面之义,而应该着眼并落脚在世界诸文明之间互动的历史和现实。尽管研究本身或研究成果之间的交流或许无法扭转“文明冲突论”“文明优越论”等的传播,但本着“设身处地、将心比心”的精神开展区域国别和文明交往的研究,终究是落实全球文明倡议的内在要求,也是推进“美人之美”工作的必要步骤。如此,不仅有望推动区域国别学研究成果的丰富和研究视野的拓展,而且可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赋予更多积极动力。

五、结语

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但“美人之

美”并未成为国际社会各行为体的互动模式。国家等行行为体即便不是以邻为壑,但距离内化“美人之美”的要求仍相差甚远。更何况有些国家或集团死守“种族优越论”“历史终结论”“文明冲突论”等思维,针对异己者进行无情打压,这无疑加剧了国际社会的动荡和危机。现实困境亟须呼唤理论的创新。然而,基于理论研究中“无政府状态恐惧症”产生的对国际关系中差异的恐惧,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也因针对差异开展“双重运动”的老路而无法自拔。而构建“全球国际关系学”或许是国际关系学绕过危机、另辟新路的一种尝试。因其呼应了第三世界或“全球南方”迫切希望在理论研究中摆脱或破除“西方中心主义”的诉求,故其业已成为一种声势不小的理论流派。而中国国际关系学者不仅积极参与其中,事实上还在文化自觉意识高涨的驱动下开展了诸多富有成效的理论创新。

站在中华文明五千年的历史根基之上,中国学者以开放包容的心态在努力创建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致力于打造能与世界文明进行平等对话的理论体系,这是中国人已有强烈文化自觉意识的体现。这种努力并非排斥他者,而是为了完善自我,也是迈向“美人之美”的重要步骤。诚如秦亚青指出的,构建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的尝试,“并非是追求建立与‘西方中心主义’对立的‘中华中心主义’知识体系,也无意于以自我文化取代他者文化,而是一种多元文明文化知识的共生共存、相辅相成、相互交融,终极目标和理想形态是构建人类共同知识”。^[36]至于在理论层面如何推进和落实“美人之美”,要求中国学者把握好区域国别学成为一级学科的契机,着力推进区域国别学与人类学、国际关系学等相关学科的密切交流和相互借鉴,深入推进对国际关系中差异的识别、研究与比较工作,进而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提供新素材、寻找新启示。这一努力如何开花结果,值得我们拭目以待。在实践层面,全

球文明倡议则为国际社会如何推进“美人之美”指明了方向,这也是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由之路。

注释:

①需要指出,因各位理论家的批判或对话对象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或思想,故这些理论中的确存在一个他者,即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

参考文献:

- [1]费孝通.关于“文化自觉”的一些自白.费孝通全集(第十七卷)[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348,536-552.
- [2]Brian C. Schmidt. The Political Discourse of Anarchy: A Disciplinary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M].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8.
- [3]海伦·米尔纳.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无政府假定[M]//大卫·A. 鲍德温.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肖欢容,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143.
- [4]汉迪·布尔.国际关系中的社会与无政府状态[M]//詹姆斯·德·代元.国际关系理论批判,秦治来,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81.
- [5]秦亚青.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读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J].美国研究,2001(2):136.
- [6]Richard K. Ashley. Untying the Sovereign State: A Double Reading of the Anarchy Problematique[J]. Millenniu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17, No. 2, 1988, pp. 227-262.
- [7]Alexander Wendt. 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 of It: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ower Politics[J].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6, No. 2, 1992, pp. 391-425, pp. 491-542.
- [8]茨维坦·托多罗夫.征服美洲:他人的问题[M].卢苏燕,陈俊侠,林晓轩,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 [9]Stanley Hoffmann. An American Social Scienc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J]. Daedalus, Vol. 106, No. 3, 1977, pp. 41-60; Steve Smith. The Disciplin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till an American Social Science?[J]. The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2, No. 3, 2000, pp. 374-402.
- [10]田文林.“文明与野蛮”叙事与等级性世界秩序[J].政

治学研究, 2023(5): 114-125.

[11]纳伊姆·伊纳亚图拉,戴维·布莱尼.国际关系中的差异问题[M].曾向红,杨双梅,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

[12]彼得·卡赞斯坦.世界政治中的文明:多元多维的视角[M].秦亚青,魏玲,王振玲,刘伟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彼得·卡赞斯坦.英美文明与其不满者:超越东西方的文明身份[M].魏玲,王振玲,刘伟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

[13]彼得·卡赞斯坦.中国化与中国崛起:超越东西方的文明进程[M].魏玲,韩志立,吴晓萍,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 11.

[14]莫斯·涂尔干,于贝尔.论技术、技艺与文明[M].蒙养山人,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 67-68.

[15]Mervyn Frost. Global Ethics: Anarchy, Freedo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M].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pp. 83-89.

[16]秦亚青.世界政治的关系理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

[17]王铭铭.人文生境:文明、生活与宇宙观[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 217-218.

[18]谭再文.对无政府结构假定的质疑[J].国际观察, 2007(5): 50-57;谭再文.国际无政府状态的空洞及其无意义[J].世界经济与政治, 2009(11): 78-80.

[19]戴维·莱克.国际关系中的等级制[M].高婉妮,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费正清.中国的世界秩序: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M].杜继东,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20]田野.中国国际关系知识体系建构中的概念创新[J].教学与研究, 2023(4): 29-40.

[21]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赵汀阳.没有世界观的世界[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22]杨光斌.论世界政治体系——兼论建构自主性中国社会的起点[J].政治学研究, 2017(1): 2-14.

[23]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与创新——刘丰教授访谈[J].国际政治研究, 2018(1): 134-160.

[24]唐世平.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从公元前8000年到未

来[M].董杰旻,朱鸣,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

[25]阎学通.世界权力的转移:政治领导与战略竞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26]Amitav Acharya. From Heaven to Earth: "Cultural Idealism" and "Moral Realism" as Chinese Contributions to Glob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J].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12, No. 4, 2019, pp. 467-494.

[27]阿米塔·阿查亚,巴里·布赞.全球国际关系学的构建:百年国际关系学的起源和演进[M].刘德斌,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

[28]秦亚青.全球国际关系学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J].国际观察, 2020(2): 27-45;高鹏,朱翊民.全球国际关系学:国际关系研究认识论的发展与创新[J].国际政治研究, 2022(1): 62-86;刘德斌.全球史与国际关系研究的历史路径[J].中国社会科学, 2023(7): 30-44.

[29]田野.构建与西方平等对话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N].中国社会科学报, 2023-09-08.

[30]秦亚青,孙吉胜,杨丹,王展鹏.区域国别学的知识体系与学科建构[J].国际论坛, 2022(6): 3-24.

[31]Benjamin I. Schwartz. Presidential Address: Area Studies as a Critical Discipline[J].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40, No. 1, 1980, p. 15.

[32]David Ludden. Why Area Studies? in Ali Mirsepassi, Amrita Basu, Frederick Weaver, eds., Localizing Knowledge in a Globalizing World: Recasting the Area Studies Debate[M]. New York: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131-137.

[33]刘琪,杨成.区域国别研究中的人类学角色探析——以英美人类学的区域国别研究为例[J].世界民族, 2023(3): 102-111.

[34]杨成.国别区域全球知识的重构与中国崛起的世界知识保障[J].探索与争鸣, 2022(8): 27.

[35]周方银.区域国别学科建设中的知识追求和学科建制[J].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 2022(3): 25.

[36]秦亚青.知识涵化与社会知识再生产[J].世界经济与政治, 2023(1): 1.